

红色题材创作的新突破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女兵安妮》
2020年12月

《女兵安妮》这本书的作者赖尔虽然年轻，但是在江苏网络文学创作界已经很有声名。她同时在高校工作，是一个创作型、学术型、批评型、策划型的网络作家。我以前对赖尔创作多少有些了解，但是读完小说，我还是感到吃惊，因为赖尔的传统文学创作并不多，儿童文学创作更少，《女兵安妮》的创作说明了赖尔创作的多面性，她是一个有着多种创作可能性的作家。在我看来，《女兵安妮》融合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特点，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有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是在主题创作上有新的探索。这是一部向建党100周年献礼的作品，现在全国上下文艺生产部门都在聚焦这一主题创作，不仅是图书，还包括其他的文艺形式。从这本书来看，浙少社在这方面应该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主题创作其实是有相当难度的，远的可以从延安文学算起，近的则可以从新中国成立来看，已经创作了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比如“三红一创”等，它们不但奠定了社会主义文艺和红色题材创作的基础与方向，而且从思想上与艺术上成就了相当的高度，即使从

儿童文学上说，也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优秀作品如《鸡毛信》《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等等。因此，我们现在要在这方面继续前进，并且要适应新的时代，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必须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女兵安妮》一方面继承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又在主题的开掘、题材的拓展、艺术的表达等方面有了新的、成功的探索，这是值得肯定的，它关注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它关注到了中国战场上的国际战士，它注意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总体性，关注到了战争中少年儿童的命运，他们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作以及在战斗中成长的经历，这些都是以前同类题材作品中较少涉及的。

其次，作为一部战争小说，它有许多新的思考。战争题材对儿童文学来说本来就具有挑战性。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战争的理解与成人是不同的。因此，儿童文学要表现战争难度大，有许多限制。我们要把握一个恰当的度，这种度符合儿童认知，符合儿童的情感，更要考虑到现代儿童阅读的接受度。正是因为如此，对儿童文学中战争题材的处理儿童文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儿童文学书写伦理，儿童文学中的战争写到什么地步？用什么表现手法？刻画怎样的人物？怎么体现战争、死亡、创伤等等，对创作者与出版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它可以衡量作者的儿童观与创作水平。《女兵安妮》以史实为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的梳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它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把新四军的作战史作为背景，讲述了我们所熟悉的抗日战争之外的新的故事，在同类题材作品的创作中体现出了新的思考。作品特别注重人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注重战争对家庭、个人命运的改变，这是很值得肯定的。虽然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但是作品的战争视角很广阔，它是在相对复杂而广大的视野下表现战争的，所以，它的线索很多，它所讲述的不是单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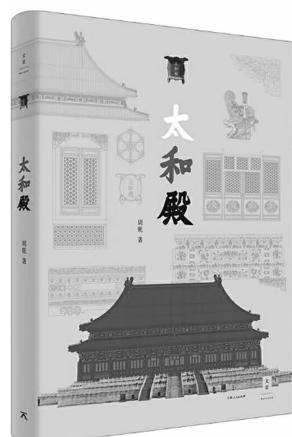
的敌我双方的八点，因此进入作品的人物众多，它是从战争参与者的角度来表现战争和安排人物的。这样，它所传递出的战争观就超出了传统的单一的战争理念。在作品中，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直接出现在战场上，同时，进入战争的人物其动机、命运与机缘也并不一样，它给孩子们认识战争带来了新启示，一旦战争爆发，就没有幸存者，也没有旁观者，所以我们表现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是一切战争作品的永恒主题。

再次是多种风格与类型的融合。《女兵安妮》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在艺术上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融合了类型小说或者说包括网络创作的多种因素，让叙述更复杂，让故事更精彩，也给孩子们的阅读带来了相当大的新鲜度。我们知道，网络文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规模和影响，特别在艺术表现方面已经形成了许多可以称为当下经典化的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本身就整合进了传统通俗文学和现代畅销型类型小说写作的成功经验。这方面，赖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赖尔所做的是在传统文学的文体与艺术框架内，将这些表现手法有机地融合进来，比如它空间的设置虽然是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但显然是借鉴了网络小说的穿越手法，比如它的悬念的设置及其释疑的过程也与网络与类型小说中的悬疑风格有关，再如它场面的描写，人物禀赋独特性的刻画以及人物命运传奇性的叙述也都带有传统文学以外的元素，这些都使作品节奏更为紧凑，戏剧性更强，当然，对小读者们来说，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总之这是一本孩子们一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作品。我们非常欢迎像赖尔这样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家进入我们的传统文学，走进我们的儿童文学，给儿童文学带来更多新的成功尝试。

（作者为著名评论家、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四海一，太和出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太和殿》
2021年1月

宫殿建筑代表着帝王的政治权威，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宗教礼法这一大主题，在制作方式、风格等方面都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成为独特的一种建筑艺术文化。现在世界上保存最大、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北京故宫——紫禁城，就是最为典型的实例。

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故宫学”书籍纷纷出版。这部《太和殿》出版于2021年1月，晚了一步，也无妨，从标题就能看出，该书专注研究的对象是故宫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太和殿，与其他作品的泛谈故宫是不同的。作者周乾是故宫古建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他的研究侧重于故宫古建筑的结构分析与保护，所以，《太和殿》的特点非常明显，这是一部古建筑构造解读的图文书，采用了大量珍贵的图片，配以简洁说明。

全书以太和殿为对象，作者有足够余暇慢慢展示这座宫殿的各种细节，举凡宫殿建筑的各种知识，包括历史、陈设、修缮、门窗、柱架、榫卯节点、斗拱、屋顶、房梁、墙体乃至雕刻、花纹、色彩，巨细无遗，皆有言及，很多图片还放大呈现了细部构造，或许比起现场观看更不遑多让，不会疏忽那些美不胜收的部分。

全书讲述逻辑清楚，图片众多，却不是混乱，作者很有条理地把它们组织整合在一起，大致按照太和殿整体介绍、殿内外陈设掠影，然后是建筑构造细部剖析，最后是相关的如匠人工作、木材运输等知识的补缀，予读者的感受，就像一趟徐缓的、不慌不忙的游览。

大略了解故宫的人，都知道故宫的建造是很讲究的。太和殿等前三殿，乾清宫等后三殿，以及太和殿（俗称金銮宝殿）上的皇帝宝座，都不偏不倚地处在中轴线穿过的的地方。该书对于太和殿美貌、内外部，采用了拉远和俯视的全景图，接着是一张极近距离的正面大殿图像，从这几张图片的次序安排就能看出作者很有目的地呈现太和殿宏伟的气象与至高的地位。

为了加强这种印象，作品随后讲述历史文化，诸如“九五至尊”的说法，999间半房屋的传说，以及《光绪大婚图》之《光绪帝亲临太和殿使逢迎》（局部）等以及仪仗设施的介绍，这些内容更加强化确立了一种意识，即太和殿始终是皇权统治的集中体现。

故宫建筑的造型形式充分围绕着“天子重威”这一核心，使用象征手法来进行艺术构思。这种建筑意识时时刻刻体现在各部分与各处的细节构造。太和殿的屋顶

为“重檐庑殿”式，属中国古建筑中级别最高的形式。面阔十一间，深五间，屋檐斗拱层层出挑，繁巧精致，飞檐描金，屋顶铺设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形成轻快、流畅的曲线造型，整体的美感使人震撼。

太和殿宝座采用通体髹金漆，代表着最高档次的礼制用品。金漆宝座所在的高台阶两侧，成双成对地设置宝象、甪端、仙鹤和香亭四种镇器，取“太平有象”之意，七十二根楹柱支撑着沉重的屋顶，中央宝座周围的六根大柱乃蟠龙金柱，光彩夺目，六根金柱上方即金銮宝座前的天花中央，是大型蟠龙藻井，巨龙口衔宝珠称为“轩辕镜”，古书记载可保社稷平安，太和殿墁地的“金砖”，非金非玉，是经过复杂工艺加工而成的一种特殊泥土……总而言之，太和殿的所有设计环节，都是极富象征寓意的。

整个宫殿群近万间建筑，同类造型中有大小外形的对比，中间又穿插门楼、大殿、广场、台阶，形成主次分明、等级有序的效果。而色彩的配合也是如此，金、黄、红色用于主要宫殿，次则用绿色，太和殿作为主体建筑在中心位置灿烂生辉，其形象就更为鲜明。设计者的构思意图，通过细致的筹划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作者围绕着太和殿揭示了故宫建筑在规划布局、造型形态、空间处理、色彩运用等方面的文化意识，包括室内外的陈设及装潢等局部，也是步步精心，紧扣主题，对于工艺程序和具体操作，该书也做了简约而到位的描述，无数匠人前仆后继把毕生心血挥洒于此，挖空心思地实现难以匹及的奇思妙想。四海一，太和出，巍巍宝殿，诉说多少不尽故事……

□汪政

在面具里 隐藏着人类的秘史

□赵青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面具之舞》
王艳
2020年12月

2011年，四川省平武县白马藏族“跳曹盖”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传统舞蹈类。根据《面具之舞：白马人的神话历史与文化表述》一书的解释，“池哥昼/跳曹盖”集歌舞乐于一体，指生活在川甘交界处两省三县（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及甘肃省文县）的白马人每年岁末新旧交替时举行的以驱鬼除疫、驱邪纳吉、祈福攘灾为目的民间傩祭仪式。

作者王艳，从小生活在这片地域，她深切地理解“池哥昼/跳曹盖”对于白马人的意义。王艳说，这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的仪式，凝结着生产、生活、信仰、习俗、观念、情感等诸多因素。漂泊的白马人在节庆时返回寨子，伴随着响彻山谷的锣鼓声、土炮声，人们载歌载舞，奔走吟唱。“池哥昼/跳曹盖”仪式还原了白马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承载着白马人的喜怒哀乐，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部作品的标题与主题，让人联想到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及其经典作品《面具之道》《图腾制度》的论述。列维对北美印第安人面具的美学特点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它们堪与古埃及或古波斯和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品媲美，而且这些面具的制作方式、风格和样式还具有仪式功能和历史分析的价值。

“池哥昼/跳曹盖”的典型标志之一，就是各种奇异的面具。俗话说，“无面不成傩”。面具正是这项研究最好的切入点。王艳搜集各类面具，解释它们的符号意义，研究面具制作的具体过程，走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县池哥昼”面具雕刻制作技艺的传承人班杰军等人，结合服装、道具、器物等展开“物的叙事”，重现了白马人的社会文化记忆。

王艳引述了列维的名言：“在面具里，隐藏着人类的秘史。”有关面具起源和象征意义的诠释，构成了分析的支点。王艳接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启发，同时也在摆脱列维的影响。王艳放弃了结构主义的框架，不刻意寻找对应，她的作品尽管是学术性质的，行文却不晦涩，避免使用艰深术语，丰富多彩的田野纪事与平易亲和的语言降低了阅读门槛，从文学的视角扩展人类学的诗化之维。

相对而言，王艳受费孝通和叶舒宪的影响更深。王艳曾获第三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踏遍白族地，拥有第一手的材料，才有生动细致的民族志描述。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费孝通就注意到了川甘陕藏等地的民族特色，王艳梳理了费孝通关于“藏彝走廊”的五次阐述及其完整概念的构建过程，让这项研究的承续传统体现其意义。叶舒宪是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在原型研究、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等领域颇有建树，叶舒宪可能给王艳提供了一些思路，处理神话中那些看起来不合逻辑的现象和情节，更贴近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心理语境。

白马人被誉为“东亚最古老的部族”，从神话到民族志，从礼仪到造型艺术，从社会结构到传承方式，这部作品在打捞记忆的同时，也完成了历史追问的一种努力。